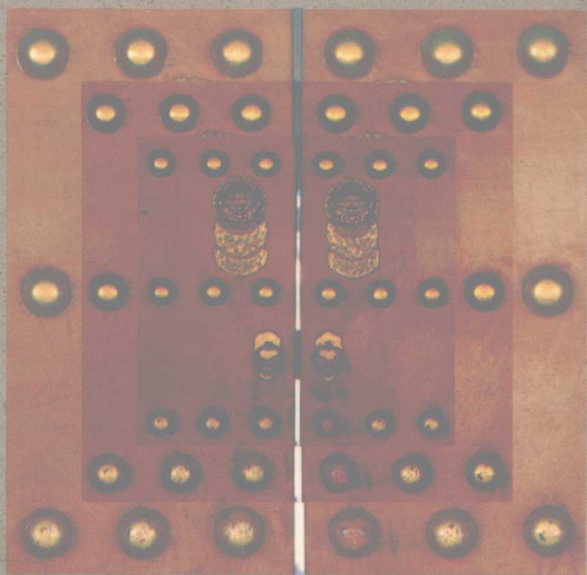


歷史的反響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劉青峰編

歷史的反響

劉青峰編

X - 6080 - 10 - 2185

歷史的反響

編 者：劉青峰

責任編輯：林道羣

封面設計：洪清淇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發 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承 印：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十二樓

出版日期：一九九〇年五月初版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04・0808・X

序

七十年前，在重重內憂外患中產生的“五四”運動以狂飈激流之勢衝潰了國人對傳統道德、禮教的敬仰和信念，令他們的眼光、心思得以從固有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轉而傾慕科學、民主、自由、平等、社會主義等外來的思想觀念，從而為困阨中的這個古舊大國，帶來了新的希望和生機。在八年抗戰勝利，三年內戰也告結束的時候，新中國誕生了，“五四”的夢想似乎也實現了。然而，不旋踵，“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大饑荒等困擾和災難就接續而來，驚破了國人的美夢。其後文化大革命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更將全國驅進一個瘋狂、荒謬的世界。

十年前，中國終於從無產階級專政狂熱的噩夢中驚醒過來，毅然撇下烏托邦式的大同理想，轉而追求實際的溫飽、富裕，從而改弦更張，為個體戶、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等種種前此被目為大逆不道的新政策鋪平道路。同時，也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復甦創造了條件。七十年代末期掀起的文學、藝術熱潮，八十年代湧現的歷史、哲學、社會、政治理論探索，乃至過去四、五年間如雨後春筍般紛紛破土冒出頭來的民辦學術團體、叢書、刊物，不能不令人感到，一場類似“五四”的新

思潮正在醞釀，中國又將面臨另一場翻天覆地的基本變革了。

去年年底，便是在這樣變動、期待的空氣之中，趁着國內學者先後訪港之便，我們斷斷續續地開始商量聯合慶祝“五四”七十周年紀念的事的。這雖然牽涉到多方學者和團體的合作問題，但由於“中國文化書院”一早已作好了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的準備，所以大家不久就都同意了採取最隆重而又簡單的辦法，即是由在北京的“中國文化書院”、“二十一世紀研究院”和香港的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等四個單位在北京聯合主辦研討會，實際會務由文化書院按照原來構想進行，其他三個單位則各就本身的有利條件盡量從旁協助。這就是今年五月一日至三日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所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由來。

當然，遠在今年之前，國內的政治氣氛就已經歷過多次變化，使人在期望之中又夾雜着疑惑、焦慮。從今年初開始，一連串的上書、請願和政府日益強硬的態度恰成對比，使人無從猜測像“五四”七十周年這麼一個重大的文化紀念日究竟將如何度過。其後，前黨總書記猝然病逝，學生的情緒日益高漲，終至爆發了四月廿七日的和平大遊行，以及隨後學生爭取自治、罷課、集會、遊行、請願、言論自由等權利的運動。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學者首途北京參加會議的時候，北京雖然非常平靜、安定，而西山更是清幽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整個會場已籠罩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之下了。

雖是如此，雖然與會者都懷着種種沉重不祥的感覺，而城

裏記者的採訪、官私兩方的邀談川流不息，但近百位來自港、台、星、日、美、澳和國內各地的學者還是平靜地照原定計劃完成了三天的議程，他們的部分文章經修訂後由各主辦單位同意交由本所出版，成為這一本《歷史的反響》論文集。集中十八篇論文，雖然包括一些對“五四”人物、事件的具體探討，但大部分則是對“五四”精神內涵和時代意義的反省，乃至疑問。七十年前轟轟烈烈，勢若扭轉乾坤的運動，今日看來不免有許多幻象的成份在內，那麼對八十年代以改革、開放為標幟的新思潮以及剛剛發生的“四·二七”運動，我們實際上又能寄予多少期望呢？這一種出於對中國長遠發展的關注而產生的遲疑、現實態度，可以在不少論文之中看得出來。

會議結束後短短一個月之內北京驚心動魄的變化，不幸證實了與會者的預感。比“五四運動”強大百十倍的一次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近五、六年才醞釀、成長的新思潮被猝然堵塞，十年來一切的進步、希望也都好像要結束了。然而，歷史往往是很諷刺的：“五四”帶來了太多的希冀，因而令人失望；那麼，在帶來這麼多悲慘、黑暗的“六四”事件背後，是否也隱藏着一些希望呢？我們深望這本集子，不但可以為上述問題提供一些綫索，更可以為響應“五四”七十周年而發生的壯烈民主運動作一個見證。

陳方正

一九九〇年二月於香港

目 錄

1	序	陳方正
1	“五四”與知識分子	湯一介
6	不能有個反民主反科學的“五四運動” ——“五四”七十周年寫給中國知識分子	周策縱
14	“五四”精神與中國之現代化	成中英
31	中西文化的歷史比較和現實思考	龐卓恒
47	危機的時代 ——“五四”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	陳方正
62	失落了的“文藝復興”	朱維錚
72	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 ——“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	陳 來
99	科學的形上化及其內在涵義 ——“五四”時期科學思潮再省思	楊國榮
113	民主的追求和理性的反思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民主思想研究	李華興
135	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 ——為“五四”七十周年而作	甘 陽

154	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缺陷 ——論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中理性的喪失	金觀濤
192	科學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貢獻	樊洪業 李真
213	試論文革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淪喪	劉青峯
243	試論“五四”與“後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郭齊勇
265	重估《學衡》 ——兼論現代保守主義	樂黛雲
276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試論陳獨秀的平民主義民主觀	顧 昕
294	衝決傳統代際文化的“狂人” ——錢玄同思想散論	蔡大成
316	“五四”時期的張若名	楊在道
330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黃遵憲	鄭子瑜
351	“五四”反封建思潮在馬華文壇的反響	林徐典

“五四”與知識分子

“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說，它要求科學與民主，因此是一文化的啓蒙運動；它又要求反帝反封建，因此是一救亡的愛國運動。在這個偉大的運動中，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無疑是起着主導作用的。但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和政治的壓力，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能真正成為一自覺的獨立的社會力量，這對中國社會來說應是非常不幸的。

中國知識分子大都對社會有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們爲了盡其社會的責任和完成其歷史使命，可以“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懷，無疑是十分珍貴的。但是，也正是這種過分強烈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感，使得他們陷於“急功好利”，而要直接地參與政治，去從政做官了。我不知道這對中國社會是“幸”還是“不幸”，不過我私心以爲“不幸”

的成份居多。照我看，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應該是以創造和傳播知識為謀生手段，他們對社會、政治的意義在於批評、議論，他們應有不與非真理和半真理妥協的良心。這或者就是我國古代“不治不議”的“士”的節操。本來“士”應是社會的一個獨立的集團，它有它的特殊的社會功能。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由於超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往往由“不治而議”走向“治而不議”了，把“做官”看成他們最重要的使命，從而失去其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功能，並且成了政治權力的附庸，“學而優則仕”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由“士”而“仕”的“正途”。也許會有人說，中國知識分子並非都如此。當然，任何事情都是相對的，不能一概而論，不過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知識分子相比，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更為強烈總是事實，他們“出仕”的要求更強烈也是事實，就像老莊和受老莊影響的（如嵇康、阮籍）思想家實在也有着強烈的“救世”要求，他們大多因為“恨鐵不成鋼”而消極遁世了。

我無意否定中國歷史上的“士”，對那些真誠肩負着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的先聖先賢們，我是敬仰的；對他們那種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追求“真、善、美”的統一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社會的抱負，我更是欽佩的。但是，由於他們超強的“出仕”要求，走向企圖依靠政治權力來實現他們的理想，這就不可避免地畫虎不成反為犬了。中國知識分子由“士”而“仕”的目的雖不盡相同，但或成“鄉愿”、或成“烈士”，總是悲劇。

一個社會當然需要有管理國家的集團力量，這就是政治權力集團，但是權力也會使人墮落，因此又需要有對政治權力的批判與監督的社會力量，這就是知識分子集團。當然合理的社會還應有一個獨立於政治權力和知識分子集團之外的工商企業

集團，這個集團的社會功能應是使社會財富不斷增長。如果這三個社會集團能够互相促進，又互相制衡，這個社會將會比較合理和比較健康地發展。中國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來說，應該瞭解自己對社會歷史起作用的特殊領域，它不應該是“治而不議”的，而應是“不治而議”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為保證自己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功能，知識分子必須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這樣才能對社會政治有比較客觀和深入的認識，並能使自己相對地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而促進社會的進步。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社會，一方面要盡思想文化啓蒙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又得擔當起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因而有時政治的要求壓倒一切，使得非常軟弱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與政治權力妥協。如果說中國的政治權力集團能使中國社會成為合理的、健康的、民主和法治的社會，知識分子作某些妥協，也無可過分指責。但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權力集團並非都如此。政治權力集團往往依靠其權力要求知識分子為他們造輿論，這樣不僅知識分子集團失去了其應盡的社會責任，同時也使政治權力集團因而得不到有效的監督而會腐化。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與政治權力相抗衡的知識分子集團，如明末東林黨等等，但終難成事。我想，也許中國知識分子“急功近利”的心態，希望自己的理想很快能成為現實，因而就不得不依靠政治權力集團了。這種心態到近百年表現得更為顯著。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沒有出現什麼大思想家、大哲學家，甚至真正能成為人類歷史上不朽的文學作品也微乎其微。這是為什麼？很可能是由於我們沒有能對中國和

世界的問題作深入的理性思想，往往就事論事，想一下子見功效。這就造成了或者是生吞活剝地照搬外國理論，或者是把自己祖先的思想不加分析地貼上現代的標籤，或者是製造一些很難自圓其說的“急救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當然妨礙中國知識分子成爲一獨立的社會力量。

雖然也有極少數學者努力對當代社會問題作理性的思考，可是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也終難大成。因此，中國十分需要有一批潛下心來對一些根本性問題作深入地理性思考，以便擺脫政治的干擾，爲知識分子成爲一獨立的社會力量打下基礎。

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無疑起了非常大的積極作用，它作爲一偉大的文化運動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追求科學、民主、自由、理性的精神將是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它的喚起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自覺的意識的積極意義將也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果，我以爲是和當時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分不開的。回顧“五四”時期，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思潮是在平等的基礎上討論和競爭的。當時西方流行的各種主義和學說都傳入中國，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柏格森主義、新實在論、尼采哲學、叔本華哲學、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等，這些主義和學說都有人宣傳和介紹；還有一些學者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同時希望更好地保存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或者要求融和中西文化，當然也有反對西方文化要全盤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派，所有這些思想派別是在一平等的基礎上爭論中國文化如何發展的問題。我認爲，在今天發揚“五四”精神時，也應發揚這一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精神，克服一元化的文化心態，讓中國文化擺脫某種意識形態的束縛而能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發展，這

不僅對文化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能成爲一獨立自覺的社會力量的重要條件。這裏我想借用《詩經·大雅·文王》的一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們的國家雖是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的古老的國家，但我們正在爲實現現代化這一新的歷史使命而奮鬥，古老而又常新，應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所嚮往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不能有個反民主 反科學的“五四運動”

——“五四”七十周年寫給中國知識分子

“五四運動”轉眼已是七十歲了，可是“五四”永遠是年輕的，“五四”永遠是個青年，“五四”永遠是個青年知識分子。這話怎麼說呢？大家也許都知道，“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的，當時提倡改革的主要刊物就叫做《青年雜誌》和《新青年》，當時最重要的學生刊物就是北京大學學生辦的《新潮》，它有個英文名字叫做 *The Renaissance*，意思是“文藝復興”或“再生”。那時的知識分子要把只聽成年人話的青年改造成能獨立思考的，能自由批判的新青年，要把古老的中國改造成“少年中國”，把頑固教條派所壟斷的舊文化改造成年輕而有活力的新文化，事實上，他們還希望造成個“少年世界”，中國人永遠能“再生”，能不斷發掘出“青春”的創造力。而這些理想又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所推動起來的。不但如此，這個理想又是需要不斷的努力，長期無盡而求完成

的。所以我說“五四”永遠年輕，永遠是個青年知識分子，實在只不過是一句老實話。

“五四運動”這個遠大的理想自然付與當時和以後的知識分子一個嚴肅而重大的責任。所以七十年來，人們對“五四”不能忘懷，時常談起，時常研討，時常徵引。“五四”一直給與中國知識分子不斷的反思、啓發和鼓舞的力量。可是由於它所提出的是些非常重要、非常基本、也非常複雜的問題，人們因為自己的背景和變遷不同，對它的認識和解釋也就大有差異，半個多世紀以來，弄得爭論不休。若是在某種適當的限度內，這種差異本極自然，甚至原不可免。不過多年來中國的黨爭激烈，“五四運動”的認識和解釋，甚至“五四”的記錄，都蒙上了濃厚的黨派色彩。只有掌握了武力、警察和公安的少數領導階層可告訴人什麼史料可以公開，什麼人可允許看到什麼資料，什麼事件須照領導人已有的看法去怎麼說。別的史事不談，單就“五四運動”而論，多年來，我們兩千多年來史家秉筆直書、臨文不諱的優良傳統幾乎完全給封殺了。而最可悲的是，助長這件惡事發生的正是我們知識分子自己！全體或大多數知識分子如果能做到尊重事實、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怎麼能容許把這樣一樁重大的歷史事件蒙蔽和歪曲這麼久呢？只因有不少在權力機構裏分得了飯碗的人，只因有不少想著書寫文章討好的人，指鹿為馬，於是其餘的人也就吠聲吠影，都衆口一聲說那是馬了。這是我們中國同胞的大悲劇之一。我說這些話時，內心十分惶怒，我自己也是中國人，也是知識分子，我當然也負有一部分疚責。然而我也是歷史學者，我不能不就我所知所感，據實寫將出來。

去年五月四日，台灣《中國時報》要我寫一篇紀念文字，

我發表了《五四：一個“百依百順”還是“不屈不染”的女孩子？》一文，指出過去多年來歪曲“五四”的方式有：“金屋藏嬌法”，禁止史料公開傳佈；“化裝改容法”，擅自塗改或偽造史料；“衆女掩蛾眉法”，突出多引大量有助於自己觀點的史料，少用或曲解不利於己的資料，以造成看來領導的解釋在事理上有壓倒之勢；還有一件令人不覺的則是“纏頭捧角法”，就是你只要把“五四”說得正合於教條，就可得到某權威方面的獎勵優惠；否則將受到貶斥或遭殃。你如對“五四”時代某人大捧或大罵一場，看捧罵的是誰，又看那權威者是誰，你也就會得到不同的獎懲。有時是微妙得很，反正久了就會造成社會一窩蜂，事實和是非便壽終正寢了。

這樣的局面現在自然已在改變之中，比過去是好多了。這次中國大陸能邀請海內外的學者到北京開會，公開討論“五四運動”，已是前所沒有的事，值得歡迎，雖然主持者事先擬好的主題不見得能使每個人都滿意。主持者也好，參加者也好，總有不同的看法，只要能公開自由討論就好。這次能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更重要的，能不能讓大衆傳播媒介如實報道會上不同的意見，這就得看事實表現了。我嘗認為，“五四”的基本精神是百家爭鳴的精神，是提倡不同思想、學說、主義自由競賽的精神。假如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我就只好請他們來重溫一下“五四”思潮的主流罷。

自從民國八年（1919）一月《新青年》月刊發表那篇《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承認“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幾條滔天的大罪”之後，大家都已認定“五四”思潮所提倡的主要是那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學。而

《答辯書》中所提到的因此而引起的罪狀之一就是“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試問七十年來，多少人打着“五四”旗幟，甚至撰寫“五四”歷史的知識分子，却在助長“特權人治”。認為政治領袖無所不知，決不會錯，一切都該依照他們說的辦，連對“五四運動”的解釋也要照他們說的來解釋。這不是反民主和反科學麼？這不是打着“五四”的旗幟反“五四”麼？承認少數人允許我們讀什麼才能讀什麼，承認少數人允許我們寫什麼才能寫什麼，包括讀寫“五四”歷史在內，這又不是在反“五四”精神麼？一個有民主思想的人，怎麼能胡塗支持一黨擁有長期無限的特權？一個有科學頭腦的人怎麼能相信領導者萬能，怎麼能放棄個人的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

“五四事件”的七個月後，《新青年宣言》就說，他們同人“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雖然他們當時對如何才能“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並沒有具體的研究，但這個目標還是不錯的。現今世界各民主國家無不在努力定出許多法律和制度來謀求和保障“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如一人一票，多數決，人民有秘密投票權，秘密通訊權，個人自由競選，候選人不由一黨指派，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司法獨立，軍隊、警察、公安特務不屬於任何政黨，兩黨或多黨對立競賽，政黨當政和官吏在位有一定任期限制，憲法有絕對尊嚴，政黨或領導人不能違背憲法，法律也不能違憲，諸如此類。關於這些，我去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演“中國知識分子和民主”時，有比較詳細的分析，這裏且不多說。問題是：我們如果接受“五四”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這種前提，如果肯定他們“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這一理想，若又不肯採用上面列舉的這些法律和制